

因循社会发展规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吴学琴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一大批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构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希望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坐标。与此不同,马克思则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弊病,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阐明了未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规律;因循现代化发展规律,列宁提出“一国胜利论”,苏联等东方落后国家成功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魔咒,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中,同样因循社会发展规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之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时代亟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提高国家软实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F124;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2-0001-09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建设谋篇布局,夯实基础。在第十篇“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特别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强调以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升国家软实力,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最初源于西方构建的现代化理论,尔后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循发展规律,列宁开辟了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现代化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回溯

现代化最早发端于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16世纪英国,随后在西欧、北美和亚洲开花结果,并在全球扩张。学界对现代化的这一发展历程基本认同,但对现代化观念内涵、“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

* 收稿日期:2025-1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人才项目(22VRC094)“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话语创新研究”;安徽省高校创新团队项目(2022AH010008)

作者简介:吴学琴(1965—),女,安徽黄山市人;博士,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吴学琴. 因循社会发展规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3(2): 1-9.

的发展道路始终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 世纪中下叶,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社会的结构特征、现代化的起源方面形成了原初的现代化理论^{[2]61-68}。涂尔干观察到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社会结构呈现出从传统的“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变化。与涂尔干同一时期的滕尼斯,则提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基本类型呈现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变迁。韦伯更是提出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了以往社会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化”。

这几种关于现代化的观念影响深远,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从多个领域多个学科进行研究,率先构建了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和列维(Levy)三人是从经济学视角理解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其代表作分别有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M·列维的《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这三人对现代理解解的共同之处是以工业化为核心,依据经济增长来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罗斯托是其典型代表,他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现代化始于起飞阶段,并伴随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成熟。在他们三人的引领下,西方现代化理论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判断标准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政治学领域也不甘落后,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Almond)在其著作《发展区域中的政治》前言中,提出按照政治结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程度来评价现代化程度,专门化和自主化程度越高,出现或创造了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则意味政治现代化的程度愈高。其后,耶鲁大学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又把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演进道路细分为英美法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道路、德日意的法西斯道路和苏中的共产主义道路^[3]。藉此,西方率先从现代化的政治结构和民主化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为西式民主鼓与呼。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生成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框架下,社会学家加快了构建现代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步伐。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把现代化视为“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的结果^[4]。同为社会学家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进一步提出随着民主和工业化进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产生了经济、政体、统一、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4 个子系统,与之相应,社会总体的适应能力也不断提高,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帕森斯以高度简单化、图式化方式揭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理论形态,被称为“新进化论”,由此构建起了以个体劳动的专门化和自由化、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社会各子系统相互平衡为核心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心理学家们则从个体心理的变迁探寻西方现代化的足迹,麦克莱兰(McClelland)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视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Inkeles)甚至把现代化直接视为一种心理态度,认为它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的改变过程。从历史学上观察现代化,又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认为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在现代社会获得亘古未有的增长,因而现代化就是“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相比之下,大家所熟悉的亨廷顿对现代化概念的总结颇具代表性,“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6],它是一个革命的、不可逆转的、进步的、同质化的、全球的、复杂的、系统的、长期的、有阶段的过程。

上述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体系、现代化阶段的社会结构功能和社会阶层、现代化的个人和群体心理标准等多方面的阐释,不仅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解,也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阐释,更有历史学的观察,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影响深远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核心则是推崇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西方化或欧洲化。在西方一大批学者的推波助澜下,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现代化理论此时已不完全是学术性的学说,而是以学术

性面貌呈现出来的关于人类进步的幻象,正如罗斯托所著的《经济成长的阶段》的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是一部与《共产党宣言》相抗衡的“非共产党宣言”。现代化的概念在此不仅是一个学术模式,“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进程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7]。这批学者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化、心理、历史等多层面、多角度跨学科进行体系化研究,试图创建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坐标体系,形成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可操作的方法,以描述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他们声称这套描述全球总体状况的现代化模式将会增加美国赢得冷战的能力。

这一点恰恰对上了肯尼迪政府的胃口,肯尼迪在1961年所作的激情洋溢、辞藻华丽的就职演说中,发誓要“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对“南半球那些生活在茅屋和村庄里的、正在为驱除大众贫困的顽疾而奋斗的各国人民”,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强自立,无论这需要多少时日”^[8]。这篇富于鼓动性和煽动性的就职演讲表明,现代化的宏大理论就是肯尼迪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法宝,这也赢得那些渴望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社会成就的“欠发达”民族国家的人心。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分析模式,分析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种认知框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维度认知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之路,并形成了一整套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居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它与20世纪初期美国政府使用过的“自由发展主义”类似,成为了统御全球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武器”。基于现代化宏大理论的认知框架和话语体系,在半个多世纪的外交活动中,西方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按照自身的战略规划确定国际组织形态,“美国的目标成了国际现实,多边主义经常成为单边主义的外衣”^[9],借“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由此管窥今日西方的“逆全球化”思潮,毫不奇怪他们为何一反常态,转变一直坚持的“多边主义”,而公开举起“单边主义”的大旗,因为这恰恰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只不过原来的隐蔽状态公开化了。观其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的确难以与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现代化之路的科学理论相媲美。

二、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阐明现代化发展规律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从西方出发,把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的商业化大众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词。虽然他们吸收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但又不自觉地过滤掉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资本批判理论。但在今天的现代化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西方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界定的现代化理论,拥有话语权的也仍然是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与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为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支持不同,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表面繁荣之下的经济危机,揭开了资本逻辑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弊病,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细阅马克思的皇皇巨著,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也正是经此研究,阐发了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话语表达:一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以当时的西方社会为典型,研究传统农业社会如何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基础、社会条件、制度保障等,可视为从经济上观察工业化过程。这一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探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发展规律,并形成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传统农业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律。较之罗斯托仅仅从工业化程度判断现代化发展的五阶段论,更为根本也更为科学。罗斯托标榜自己的理论为“非共产党宣言”,显然只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而非完全科学的论证。二是社会运行的规律,即通过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上的比较,阐明其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的主要区别以及社会调节、控制和管理的不同,从而揭示现代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和要求,简言之就是阐明与工业化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用阿尔蒙德和艾森斯塔德的理论

解读,就是政治结构和功能分化、制度的专门化过程。三是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即将现代化放到全球化过程中来考察,不是把现代化看作一个孤立的民族的事情,而是看作一项世界性的事业,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亨廷顿把现代化视为全球的、革命的、同质化的、不可逆转的、进步的过程的原因,这一步亨廷顿的确正确理解并运用了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但却把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殖民统治导致的不发展归因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显然找错了方向。因为 20 世纪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发达并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殖民压迫的结果。四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即通过社会异化、物化等现象的分析,揭露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刻矛盾,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and 变革出路;西方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维度构建的现代化理论,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无不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一根本矛盾。由此可见,前面述及的从经济、政治、心理、文化和历史的不同维度对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并风靡全球的“理论创新”,无一不来自马克思前三部分的理论资源,但也无一不自动过滤掉了对资本批判和未来现代化道路在何方的理论追寻。亨廷顿甚至极端地判定现代化之路必然终结于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化发展最完美的结局,相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只是残存于人们心中的夕阳。

时至今日,放眼全球,马克思,也唯有马克思,其关于现代性社会的病理诊断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辩证批判,尤其是关于现代化道路的原则性设想,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必然经由共产主义走向未来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一条真正的现代化之路。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以及在此之上关于社会历史真实关系和发展规律的伟大发现,让我们从中明白,虽然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只要我们端起马克思主义这台观察世界和理解社会的“望远镜”,对各种现象加以批判性考察和穿透性理解,拿起马克思主义这把剖析社会结构和机理的“解剖刀”,对现代社会这一机体作深入解剖,从中把握其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把握现代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就会让我们坚信美好的现代化之路不仅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反而开辟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新路,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康庄大道,也是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相反,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效仿西方道路、寻求快速发展的亚非拉国家,却无一走向像西方现代化一样的致富路。

三、列宁探索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 1848 年欧洲革命方式的批判,对 1871 年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革命的策略内容,也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康庄大道的必然手段。但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呢?马克思晚年转向关于东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原则性探索,在世界历史视野下展开对古代和东方社会的研究,这也是东方社会问题的由来。马克思沿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分析由于资本的“国际贸易”和开辟“世界市场”的必然性,东方社会势必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造成的现代性危机也势必波及全球,东方社会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社会何去何从?东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何方?马克思进行了深入探索,《人类学笔记》就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东方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前途思考的成果,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论述,包括《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等材料,所揭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及跨越的限度,又以个案形式呈现了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的设想。

这一设想首先由列宁在苏联实践。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守着俄国贵族的农庄,抱守残缺,幻想停留在农庄经济,至多用小资产阶级的手段改造之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时又以更广阔的视野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进程中,极大地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斗志,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在实践中成功例证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革命胜利后,列宁进一步探索东方落后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仅仅期望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之需。彼时沙俄的专制统治下的农庄经济关系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沙皇的专制制度严重制约了俄国现代化的步伐,至1897年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工业生产水平和产量远低于欧美。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虽然彻底推翻了沙俄专制统治,促进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形成,但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因为仅仅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依然不能适应大工业发展的需求,因而很快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因为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广大工人当家作主的生产关系,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走向了快速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俄国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实行现代化,这是一种非西方的发展方式”^{[2]244},但正如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阐明的观点一样,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取决于当时俄国是否“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0]590},这种农村公社虽然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0]587}。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仍然需要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得以巩固。因此,新生政权的根本任务仍然是要发展生产力,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隐约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曙光。基于此,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一是在一个农民和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要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的看法,通过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用合作社形式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至今我们所熟悉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就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思考最通俗的表达;三是提出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四是转变观念,进行文化革命和机构改革,实现观念的现代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之问与列宁主义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

在“一国胜利论”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规划,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手段,高速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国家,拖拉机化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飞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及至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已跨入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从1928年到1937年近10年的快速发展,苏联建立起了以重工业为中心,工业门类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已超过英德法,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实现了“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11]。苏联通过高积累高速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手段,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经济发展战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饱受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由于多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终止,但不可否认,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开辟的现代化发展大道,首先在东方社会落地生根,并一度展现出强劲发展态势,今天依然产生重要影响。

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

正如上述的梳理,西方现代化理论知识体系的研究,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一浪高过一浪,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社会话语体系等。在西方现代化宏大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感召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制度移植、文化渗透和技术垄断固化发展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国家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导致部分后发国家陷入路径依赖。反思这样一条道路,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对未来现代化之路规律性的探索,证实了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资本主义文明下的野蛮本性,也就不可能照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重大超越,不仅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解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现代化之问”,还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视角。

马克思基于资本批判所构想的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之路,在中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出了丰硕成果,走出了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围绕“工业化”与“农业化”“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现代化建设。到 1956 年,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已经较为充分地显现出来之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而之”^[12]。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历史性目标,举国上下也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中。今天,党的二十大报告又从战略高度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因循客观的历史规律,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3]²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道已经日出东方,曙光初照。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学界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各学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早就提醒道:“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在中国式现代化阔步发展之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成为紧迫任务,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来,学界对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从理论概念到发展实践、从道路方向到乡村振兴、从中国特色到世界意义,等等。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土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回应“两个结合”的时代课题中重构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从历史纵深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兼具普遍性解释力与特殊性经验基础的话语体系,从而在意识形态交锋中掌握定义现代化的理论主权。一是从哲学理念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哲学理念有相同之处,都秉承社会进步论,但中国式现代化有独特的哲学理念,蕴含和合共生、开放包容、天下大同等独特的世界观,而不是一花独放、以邻为壑的共处理念;体现为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而不是资本逻辑的理念,本质性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特有的价值指向、价值目标和价值情怀;蕴含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演变机理、发展规律,因应的战略策略等大历史观;蕴含着共性与个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文明观;蕴含着人民性、自主性、共识性、效能性、系统性相协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这“六观”展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理念,明显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哲学理念,是我们自主创造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典范^[15]。二是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看,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有相同之处,都是依靠资本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前行,也离不开资本,而且迫切需要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资本生成和运动,资本是推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市场在包含资本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与西方现代化放任资本逐利本性,甚至放大资本逐利本性而置广大人民生死于不顾不同,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协同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平竞争法律规则体系,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构建和谐劳资关系^[16]。发展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挥政府主导,市场决定的作用,提高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防范风险的治理能力,发挥了资本加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利用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从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资本创造性的成功引领。三是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看,西方用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论或政治功能论为其现代化之路奠基。时至今日,观西方资本主义之发展,当民主政治已失去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获取利益的价值时,经济上的脱钩断链、政治上的“小院高墙”便悄然产生。而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结构论或政治功能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3]23-24}。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五个重大原则基础上,才能创造这样一种文明的新形态。从政治的治理结构和体系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宗旨,推进社会治理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整体效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17]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套治理模式,其发展之路恰恰是在马克思开启的现代化发展大道上,在对资本批判中矫正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误区,既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又不让资本如脱缰的野马唯利是图,而是坚持人民中心,让资本投向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从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的法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既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总论的新时代法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又完善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分论的新时代法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包括各个部门法学、法史学、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法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生动实践的法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既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法治保障等传统法治场域的法治知识,又包括依法执政、社会治理、涉外法治等领域的法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今天,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融通中外、系统思维、胸怀天下为原则,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扎实推进依法行政^[18],“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13]42},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在实践中逐渐凝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公法学范畴体系、私法学范畴体系、程序法学范畴体系、涉外法学范畴体系,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话语体系。五是从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19]5}。因而,如何解决14亿人的衣食住行需要,增进民生福祉是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办好了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坚持系统治理与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专项治理与源头治理有机结合,增强社会活力,确保社会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大大提高,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六是从文化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看,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20]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文化自信基础,有经久不息的动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性规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性规定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代性与空间性规定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深厚的文化内涵^[21]。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国近代文化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基础^[22],并将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话语体系,终将凸显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质言之,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提出的五个基本特征、九条本质要求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怎样的现代化,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五个坚持”的重大原则解决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前进方向、发展道路、价值立场、发展动力等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一完备的理论体系生成了从领导和立场到方向和道路、从特征和原则到动力和机制的逻辑自洽、体系严谨、内涵丰富的自主话语体系^[23]。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19]5},这条既有现代化的一般普遍性,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中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初步构建了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必将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而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2).
- [2]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3]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
- [4] 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理论[M]//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48.
- [5]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1.
- [6]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0.
- [7]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
- [8] SORENSON, THEODORE. ED. Let the World Go Forth: The Statements, Speeches, and Wrotings of John F. Kennedy, 1947-1963[M]. New york: Dell, 1988: 12.
- [9] KUNZ, DIANE. Butter and Guns: America's Cola War Economic Diplamac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12.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5.
-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6.
- [1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 [15] 学习时报编辑部.中国式现代化六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1.
- [16] 张占斌.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9-126.
- [17]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式现代化:人间正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68-172.
- [18] 冯玉军.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35-136.
- [19]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0]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EB/OL]. 人民网,(2023-02-07)[2025-12-0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207/c1024-32619489.html>.
- [21] 张荣军,邵云贺.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兰州学刊,2024(5):5-13.
- [22] 翟锦程.百年变局中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自主知识生产能力提升[J].思想理论战线,2024(3):127-131.
- [23] 吴学琴.在回答“四个之问”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9):72-81.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Line with Societal Development Laws

WU Xueq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scholars have constructed a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acros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aiming to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global modernization. In contrast, Marx offered a trenchant critique of the modern maladies arising from capitalist development, revealed fundament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lucidated the laws of modernization that guide the future shift toward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Adhering to these laws of modernization, Lenin proposed the theory of “Vict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and the backward countries in the East, such as the Soviet Union, successfully broke the modernity curse of capitalism and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Over its century-long quest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imilarly followed the law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forging a distinct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ited to China’s conditions. Confronted with new circumstanc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it is imperativ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ros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domains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laws of development;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责任编辑:邓龙奎)